

第1版
2017年1-2月 总第73期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USA)

# 世界文化論壇

##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 1540-2339 地址: P 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網站: www.postmodernchina.org
--

### 气候正义与心理疗法 (上)

[美] 道娜·奥兰治 (Donna M. Orange) 哈尔滨工业大学 庞雨荟 译

心理治疗师似乎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泡沫中工作的，尽管他们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对于世界中处于最弱势的群体的责任，更有意识地去团结蒙受苦难的人。科学家们用最急迫的声音告诉我们他们所发现的事情，那就是气候已然发生了变化，成为了压倒一切人类试图遏制灾难的尝试的威胁。我们精神分析学家继续静静地忠实地工作，开车去上班，坐飞机去参加会议，浇灌草坪，随意地饮食和购物，一如往常地生活。与此同时，大多数政治和金融的领袖密谋隐藏糟糕的事实，那就是对我们而言不再是简单的不便而是会有可怕的结果，而我们却允许自己视而不见。我们这些心理治疗师，甚至精神分析学家或许应该做的更好吗，齐心协力维持一个对周围环境无意识的状态？我们有助于让煤矿里的饮食更安静吗？

虽然我近期的工作已经进行了自我扩展，超出了我的专业领域关系精神分析——最初在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和主体间的系统理论——(Orange, 1995) 以此来与所有在人文精神疗法领域的同事对话 (Orange, 2010, 2011)，同时，最新的结果表明 (Orange, 2016)，这一问题在人道主义工作者中更普遍 (护士、教师、援助工人，各种看护人员)，这些让我重新回到对精神分析传统的影响的思考。在接受了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所准备的广泛的教育和培训，包括强制性的个人分析后，我相信我们具有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能力，同时也将承担起作为领导的责任，道德上的而不是科学上的责任。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于备受瞩目的沉默中。

精神分析学家在哪儿，我们是谁，把我们自己看做心理治疗和理解人类动机的才智领袖是对是错？也许我们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例子中什么都没有学到，他被他的工作热情、对德国文化启蒙运动的热爱以及变得像鲁比尼和达尔文一样重要的需求所蒙蔽，看不到他

和他的犹太家庭，以及精神分析本身，在30年代末的维也纳所面临的生命危险。在另一个例子里，几年后伦敦的闪电战中，在一个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关于仇恨和侵略的起源的激烈辩论中，Donald Winnicott指出他们的实际效果：“我想指出，有一个空袭正在进行中” (Grosskurth, 1986, 第321页)。我们是否太过专注于我们的理论，更糟糕的是，在我们的理论和教派纠结于孰是孰非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注意到，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危及到我们赖以实现职业理想的地球？我们都说对于精神分析这个磨粉机来说，一切都是它的谷物，但是如果这场危机已经威胁到磨粉机本身了呢？

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加上我们在其他治疗领域的同事，都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做出特殊的贡献。我们不仅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上，同时也能注意到世界上的弱者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在最好的精神分析惯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历史无意识的形成，故事里的无意识的仍然活跃着的鬼怪 (Freeman, 2012)，这些使我们在面对我们牵涉其中的或是正在承担的痛苦时无动于衷。我们可以唤起我们自我防御更自私的一面，让我们采取回避性的防御以及决定那些使我们太难做出适当的反应的创伤的形式。我们可以对悲痛的过程给予帮助，不仅仅是回想起生活的方式，也包括被丧失的各种各样的希望和对于未来的确定。

从拉丁美洲气候正义的领袖们、第一个加拿大领导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那里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打心自问或是问他人，包括我们的患者——处于这样一个危机的时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由此能够得出比我们那些善于分析的祖先更具创造性的结论。然而，我们并没有时间去浪费。在Bill McKibben的书中说：“不再有任何的长久可言。”

#### 科学：我们将会“知道”的事情

紧急的情况需要快速的反应。伴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长，气候学家 (IEA, 2015; IPCC, 2014a; NOAA, 2015) 警告我们，我们的海洋和大气变暖速度比他们五年或是十年前预测的快得多，而且我们很可能会使增速变得更快，我们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对地球及地球上的生物将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的“临界点”。NOAA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的报告显示，2015年的7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2015年也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年份。夏季的冰盖几乎从北极消失，同时，南极西部的冰盖正在向海洋中滑动。根据斯坦福森林研究所的Paul Ehrlich对环境的报道，越来越多的物种正在以100倍以上的“背景灭绝率”消失，与此同时，如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 (Hobbes, Gaskin, & NetLibrary Inc., 1998) 在十七世纪所言，人类的生命迅速沦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极端的经济不平等——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一些人认为它们是单独的问题——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它与气候危机密不可分。我们必须考虑将社会公正和气候变化有机的结合起来，构建气候正义问题。

IPCC还基于多种模型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无论我们是否采取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将发生彻底的变化。他们假设出一个显著的“缓解”，即在在本世纪通过降低碳排放量，将大气变暖降低到2摄氏度，这将会使危害控制在可适应的范围内。他们警告，如果继续目前这种发展模式将会带来4摄氏度的升温，并且会打破所有能够适应环境的可能性 (IPCC, 2014b)。他们强调：风险不是均匀分布的，一般来说，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及其居民将会承担更大的风险。

许多观察家们基于他们的惊人的报告，字斟句酌地认为，2%至4%的升温这

样的估计过于保守。只有我们即刻停止把碳排入大气中，在2030年之前转变能源使用结构，使用可再生的新能源，我们才有适应这种不可逆的损害的可能。即使是温和派的观点也表明了逐渐的升温会不断地累积影响，在达到“临界点”之后，这种影响将会迅速且灾难性的爆发，让我们措手不及，没有时间和机会再去适应这一切。对碳排放的不作为意味着在本世纪末之前就极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更为保守的一些人仍然担心IPCC的结论，即使在最佳的缓解状态下，即碳的自由基减少 (来自交通和各种能源的生产) 和一级甲烷 (大部分来自水力压裂法和畜牧业) 的排放，将升温限制在2摄氏度之内，显著的气候变化已经需要我们去适应，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方面。为了应对海平面的上升，岛上的全部居民都需要被转移，而现阶段，已经有大批的战争和饥荒的难民涌入欧洲 (Ryde, 2016)。他们强调，如果不立即彻底地远离化石燃料，包括大幅度的减少消费，4度的升温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这将使我们的地球在本世纪末就不再适合我们生存。如IEA一样，IPCC警告我们，每一级的单位 (世界、地区、国家、次国家、地方) 为了避免可怕的后果发生，都必须彻底改变。

他们还告诉我们，现在仍然有改变的可能性，包括到2030年，化石燃料的彻底的变化，但是这些将需要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作为强大的推动力来完成，诚然，他们也是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又一次宣布了迄今为止关于燃煤电厂的最强烈的限制的规定。虽然这跟需要的比起来九牛一毛，但是即使是这样试探性的倡议仍然遭到了大规模的主张建立“能源”优势的反对者的抵制。)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充耳不闻这些警告继续我们的工作。是如同George Marshall认为的那样，我们的大脑自动屏蔽了坏消息吗？还是如同研究精神分

### 本期主要内容

气候正义与心理疗法 (上)	第1版
工业化农业是“养活世界”的最好选择吗?	第1版
有机马克思主义—21世纪社会环境哲学 (下)	第2版
全球剥削与新自由主义	第2版
重游阿柯圣地	第3版
冲绳人长寿的秘密	第3版
关系是通向愉悦与自我实现感的桥梁	第4版
将静观带入你的生命中 (十六)	第4版

析的社会学家Renee Lertzman 认为的那样，患了“环境忧郁症”，还是像我想的那样遭受了气候的心理创伤呢 (Orange, 2016)? 还是说，我们继承了哲学的利己主义，拘泥于一种自恋心态的占有的权利，甚至是被无意识的种族特权和延续了几千年的奴隶制度禁锢和僵化了我们的思维呢？一切都可能是真的，但是如果哲学、历史和精神分析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找出问题所在，那么世界上的道德和宗教的领导者很有可能联合起来，改变政治潮流，创造出一个团结的“临界点”，以此来与已经若隐若现的碳临界点抗衡。

#### 现代启蒙运动

我们西方人要承担气候变化的绝大部分的内疚和责任。无论我们怎样去看待今天的中国，他们所遵循的工业化的成本模式都是我们所建立的。如同Stephen M. Gardiner所言，“自工业革命开始 (1850年至2003年)，美国占全球排放量的29%，欧洲国家占26%，对比而言，中国和印度只占到8%和2%” (2011, 第315页)。为了解我们和地球间的关系哪里出了问题，包括我们对待弱势群体的冷漠，我们必须提及欧洲17和18世纪科学理性与政治个人主义的利己根源。这些都是美国的建国理想。

#### 不平等的创伤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气候危机对我们人类的影响是不平等的，一些人仍然处于相当舒适的生活的同时，仍然处于饥饿、无家可归、穷困潦倒的贫苦大众在不断地增加。比起同处地球的这些兄弟姐妹而言，我们中的一些人拥有更多的应对资源。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远离海平面上升，远离饥荒，远离战争。我们可以像之后被我们所采纳的法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和预言家列维纳斯激进的 (下转第3版)

### 工业化农业是“养活世界”的最好选择吗?

[美] 凯萝·庄斯顿 马翠明 译

有论者称，工业化农业比任何其他农业耕作方式可以生产更多、更便宜的食物，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全世界都会实现工业化耕作——也就是说，没有其他可能的办法能够养活全世界现在已经超过70亿，而且有望迅速增长到90亿的人口。很多人由衷地相信这是真的。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有机种植的食物有益于土地和人的健康，但是对于已经富起来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就像对空气和水污染的控制一样，必须等到一个国家足够发达的时候才能负担得起。但这真的是唯一选择吗？

####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农业工业化之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农业在美国仍然是家庭里的一件大事，他们经营小型到中型的农场来为当地人提供食物，而且大部分人依然受雇于农业。当时存在转向工业化的力量，而二战的爆发大大加速了那些力量。在美国，数百万的年轻人，加上很多妇女，要么被派往国外战场去打仗，要么受雇于军工厂。劳动力减少了，而且农业劳动力突然几乎不存在了。同时，美国不仅需要养活本国，而且需要供养战争机器，再加上帮忙养活我们的盟友和那些正在挨饿的千百万人，这些人的生命被全球性战争所颠覆了。燃眉之急是用最少的劳动力去解决增加食物生产的问题，因而代价——无论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在接受挑战的紧迫性中成为无关紧要的了。

于是，机器被引入以代替人力，人造肥料被合成并被用于替代自然的、但耗时且劳动密集的方法，大面积播种一两种植物使其更容易使用机器并提高产量。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歌颂美国需要“养活世界”的声音不但唱得更响了，而且人们还发现人造肥料、化学除草剂和杀虫剂是有效的，这对化工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此时军工生产大多已经结束了，这些公司便转向生化农业，并在食品加工中使用越来越多的化学添加剂。

二战结束时，代替回到传统农业，美国实施了继续引进大规模的工业化方法的政策，包括农田被兼并到少数人手中，在食物供应的各个方面都使用化学制品和能源。其结果是增加了特定农作物的产量 (比如小麦、玉米和大豆)，而且它们被出口到全世界。很

多人由衷地认为，这样做使数百万人受益，并生产了更便宜、更安全和更充裕的食品——还解放了数百万人去从事其他的工作。人们为越来越少的人养活了越来越多的人这一事实而感到自豪。在很多地方，人们一直持此观点。

然而，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这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内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接触到喷洒化学品的孩子开始生病，农场工人也是一样。水土流失变成了“从围栏到围栏”和种植单一庄稼的一个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他们不能幸免，如果不想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他们就需要购买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机器和更多的化学品，而这也只是为了能够维持下去。即使那样，联邦的政策还是鼓励农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并通过对公众征税，去大量地补贴这个系统——这个办法保持工业化生产的食品“廉价”，同时，那些试图用更可持续的和更健康的方法种植的人就没有竞争力了：他们被告知“要么扩大，要么出局”。所以，他们被群众推出去了，不管他们是否想放弃农业。工业化农业系统的真正代价一直被掩盖了，包括财政补贴、破坏土地等。利用价廉能源的人造机器看起来比使用人力更“高效”，实际上却增加了农民和大众的健康危机，伴随而来的是患糖尿病、肥胖、糖尿病、不育的增加，和一大堆的其他健康问题。结果“便宜的”食品一点都不便宜，而且正在昂贵地花费那些依靠他的人的钱。

#### 随着农业工业化过程在全世界的蔓延，工业化方法的效率也在连续下降

这些年来，昆虫和疾病对于化学品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多有抵抗力，土地的营养物和对微生物有益的东西被侵蚀，因此，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化肥和除草、杀虫剂，同时，在遇到干旱和病虫害的时候土地越来越没有修复力，而且人们对人们健康的不利影响正在接近泛滥的程度。工业化农业体系的回答是，更加努力地开发更有毒性的化学品去应对每一次挑战，这已经导致需要经生物工程处理过的植物去忍受这些更有毒性的环境。随着那些转基因农作物的引入，跨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已经开始获得控制这些植物种子的权利，也就是说，这些植物的种子不能自我繁殖，而是农民每年

必须从这些企业手中购买。而且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在大规模的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发生，与此相关的一种情况是，我们将需要更多具备恢复性的生物，而不是去减少它们。

尽管在工业化农业中也包含很多好的意图，但是，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明显地不可持续，从长期和短期来看，它正在引起土地和人们自身的一种健康危机。土地变成了沙漠，能够维持植物生长的、充满微生物的自然肥力受到损害。于是，土地就依赖于化学制品的投入，以弥补人们对土地自然肥力的破坏。人们最终只能沉溺于各种“垃圾食品”，这些垃圾食品在“充裕”的基础上通过提炼和包装过程而生产出来。

甚至更加令人关注的是，这个过程被越来越少的跨国公司所控制。一旦农业稳稳地被他们所控制，国家就会以农业综合企业玩弄规则而告终——这些规则要求人们全面参与到这个对转基因作物上瘾、化学品投入和进行加工的体系中，而且所加工和包装的“食品”也是使人上瘾和不健康的。

为什么会有国家允许这类事情发生？尤其是当存在可替代方案的时候，而这种方案又证明自身是有效的，对每一个人都更健康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是可持续的——同时在满足气候变化的挑战方面所需要建立的修复力上有效得多。

#### 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来“养活世界”，倡导可持续的农业

一个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民提到：“我们是严重的化学品的使用者。有一天，我丈夫在田地里发现一些小土鼠，并把它们放到一个麻袋里给孩子们看。这个麻袋曾用来装施加于玉米地的一种化学品。当他打开麻袋，那些小土鼠摇摇晃晃的就死在了孩子们的面前。带着恐惧感，我们开始思考那些化学品用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身上会怎么样。我们就开始探索可持续的农业方法，并决定尝试一下。很快我们发现，我们的净收入维持在同一水平——而且我们又开始享受农业了，我们深信我们所做的对土地、我们和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

当一小部分美国农民正在从工业化农业系统退出

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正在上升的运动，而且现在有更多的证据显示，使用可持续方法的小块土地精耕细作，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都能够获得高产，同时对土地和各个层面的人都有多重好处。

很多古代文明，在他们的生态背景下种植庄稼种得很好，如南美就有数十种土豆，在每一个小气候下都有不同的品种，而且有时候在一个斜坡田地里会多达58种。传统的农业保持可持续是基于学习怎样与具有创造性的自然过程合作，而非与自然作对，并试图把几种农作物强加于土地上。

是的，可持续的农业是更加劳动密集的，但是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是一种新方法，而非一种缺陷。世界很多国家，农民被迫迁徙到城市里找那种没有存在感的工作。如果把政策改变一下，鼓励乡村发展即改善农业和维持更多的人留在农业领域，为什么没有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想这么做呢？

的确，全世界范围内，主要的经验正在证明，传统的方法和知识是可持续的，同时还可以在面临越来越干旱的条件下提升土地的修复能力，又能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被称为“农业生态学”的这种运动使用应用科学和技术创新，但是，它是把它们用于农业中培育自然的、本地可利用的资源，而不是通过昂贵的外部输入去提高土地的肥力，同时用生物的方法去治理昆虫，等等。可持续性、健康加上与自然的创造性合作是首要的目标，这些目标用于管理所使用的科学和技术。结果表明，当农业生态学在与传统农业的合作得以实现时，产量提高了，甚至土地的修复能力也大大提高了，而且庄稼和人身上的疾病减少了。

有一个关于农业生态学的联合报告吸收了全世界已有的研究，包括很多由联合国所支持的项目。这份报告认为，世界上已经生产了接近100亿人口的足够的食物，但是其中多达1/3都由于市场问题和市场扭曲，以及浪费而丧失掉了。问题是，世界不能只关注用工业化农业等高产的方法去满足世界上正在增长的食物需要，而不关心能源、土地和人们的健康、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代价。整个系统需要用更有效的东西来代替，包括缩短供应链、减少能源的使用、减少污染和有害物质、更多的碳回收、更加节省和保留水、为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下转第2版)

### 征稿啓示

《世界文化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美國) 主辦。面向兩岸三地及美國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增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福祉。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名校推薦 (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那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那一句話，特色店 (廣告) 等。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潤筆費千字10-20美元。電子稿件地址：ipdclaremont@yahoo.com 網址：www.postmodernchina.org

### 《世界文化論壇》報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任平 成長春 劉孝廷 劉笑敢 劉全華 曲羅厚 李晨陽 李惠斌 陳俊偉 吳國盛 陳榮灼 楊富斌 金惠敏 歐陽康 俞懿嫻 顧林玉 鞠實凡 安樂哲 溫恒福 張修玉

###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樊美筠  
編委：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謝文郁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李銀玲  
顧問：叶朗 朱德生 周桂钿 乐黛云

## 全球剥削与新自由主义

米格尔·阿·德·拉托尔

哈尔滨工业大学 贺庆利 译

希腊帝国的文化影响、罗马帝国至高无上的力量，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霸权以及整个英国的全球影响，当它们同美国的文化统治、军队力量、资本家的热情以及其全球影响相比较时，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帝国”这一术语已经不能被狭隘地界定为对那些必须朝贡的外国土地的物理性的占有。今天帝国已经被理解为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这一经济体给那些通过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其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提供经济利益。

实际上，今天美国的支配性的影响如日中天。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享受着如此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以前的帝国依赖于暴力，但美帝国主要依赖于经济力量。美国通过其经济力量决定与其他国家交易的条款，并确保那些利益流入美国以及流向那些同意交易契约的国家的精英们。以玉米为例，在世界许多地方它是生活的一个主要食品。

当墨西哥农民千百年以来都是使用驴拉犁在小块土地上耕作并依靠雨水灌溉这种方式种植玉米的时候，他们的美国同行则主要是在机械化的大农场上进行耕作，依靠卫星图像给作物浇水和施肥。因为在墨西哥种植玉米有丰厚的补贴，所以对于墨西哥人来说，买美国出口的玉米比买他们自己种植的玉米要便宜。根据农业与贸易政策的研究所，美国玉米的价格比墨西哥当地种植的玉米要便宜25%，这意味着墨西哥农民在其种植的每一英亩土地上都只赔不赚。今天，美国的补助玉米几乎占全世界储存量的一半，而美国制定的世界玉米价格如此之低，以至于它消除了所有的国产竞争。实际上，美帝国掠夺了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穷人，这些人生活在乡村（穷人几乎都是农民），并且依靠出口他们的农作物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最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制定了一个15年的周期，以便逐渐提高美国玉米的产量，并在不收取关税的情况下出口墨西哥。然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墨西哥心甘情愿地提高了配额，以便帮助它的鸡肉和猪肉加工厂。据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代表所言，配额的暂停直接有利于作为他们同事的谈判者——爱德华多·布尔，他的家族拥有墨西哥最大的鸡肉加工厂。尽管配额的提高有利于他家族的生意，但当50万玉米种植者遗弃他们的土地，迁居到城市，以寻找到一份新生计的时候，墨西哥大约损失了20亿美元的关税。对于墨西哥人来说，美国廉价玉米流入他们的市场并没有转化为廉价的食物价格。恰恰相反，玉米粉圆饼和玉米粉的价格控制得到了提升，这导致它们的价格提高了3倍。一点也不奇怪，尽管世界银行仍旧吟唱着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赞歌，但是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引导的一个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的一个十年里，并没有在墨西哥产生大量的工作增长，而且还给成千上万的农民带来了苦难。在2004年（通货膨胀调整）墨西哥的实际工资比

1994年他们采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要低。此外，额外的收入不平等也更加严重，美国的外来移民也在持续增加。

在2002年早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由乔治·沃克·布什签署的法案，法案规定在8年的时间里授予农民1000亿美元作为津贴。直到2003年，世界最富有的那些国家已经给予他们国家的农民超过3000亿美元的补贴了。这些补贴赋予了具有工业规模的农场以特权，即：允许他们生产比国内消费所需的更多英亩的农作物并且以低于本地农民所规定了价格将剩余的农作物出售海外。甚至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都谴责这些富人一天“浪费”10亿美元在农场津贴上，这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伊恩·高登清晰地指出：“减少这些补贴，并且清除农业贸易障碍是富人可以为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脱离贫困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每一个农民被迫离开这片土地意味着另外一个被迫移居到这种城市的生产者，连同他的家庭一起成为又一个消费者。这种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对未来食物救援的永久性需要。（乔治 1987:8）

## 新自由主义的诞生

美帝国的产生既不是意外也不是运气的结果。在二战结束时，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试图创建一个能够重建欧洲的经济秩序，以防止任何进一步的世界战争。人们把自由贸易看做能够带来全球秩序稳定的方法。尽管最初的目的或许还是高尚的，但到最后，这种新经济秩序推进了世界第一银行和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者均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产生）以及跨国公司的的发展。美国和它的西欧同盟国以牺牲周围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发展他们的经济财富，这些周围国家为它们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这些不发达的周边国家就成了某一产品的开发中心。曾经被看作殖民主义的东西被一种更加现代的全球剥削方式所取代，我们通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即：世界大国直接占据别国的土地以便榨取他们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只要新自由主义一直持有把他们自己放置在世界中心的优先权，那么落后将会持续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基督教伦理响应全球不公正一定始于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经济术语。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从东欧集团（neo-意指新的或最近的）瓦解以来，人们便创造了这个词语来描述全球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政策的社会和道德含义。批评家坚持认为新自由主义应对不断增长的全球财富差异负责，并且它还创造出一种寄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整个世界的穷人牺牲他们的人性来服务少数享有特权的人的需求、欲望和愿望。新自由主义给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提供了如下权利，他们决定生产什么，由谁（国家或个体户）生产，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给这些成品支付什么，利

润总计为多少，以及谁从这些利润中受益。尽管富国制定了帮助所谓落后国家的国外援助计划，但是比起在人道主义或慈善事业的伪装下返还社会，更多的世界财富通过不公平的贸易协定，以原材料、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形式被榨取。第一世界继续通过开放的市场占用弱势国家的资源，这就导致国内在满足支持任何人类生活标准类型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的缺失。

不管他们有多么残酷，确保稳定的政治体制是经济市场运作的前提。政治的稳定取代了我们对自由和合法权利的需求，我们需要它来确保稳定和有利可图的商品的流入。因此，美国的历史在给予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和任命保证社会稳定的暴君以压力（就像发生在危地马拉Abenz政府，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和在伊朗的摩萨台政府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新自由主义继续扩张的人们，通常将经济结构与像自由这样的民主美德相混淆。因此，我们可以把对现今经济结构道德标准的提问理解为对民主自由的抨击（乔治 1999）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新自由主义看做一种与宗教运动相类似的发生在世界银行内部的运动。根据经济发展专家苏珊娜·乔治和法布里奇奥·沙贝利所言，世界银行是一个超自然的非民主机构，它的作用与教会很相似，实际上是中世纪教会。它有自己的教义、组织森严的等级制度、它宣扬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义和一套自我辩护的类似宗教的模式。”（1994:5）

对于神学家克罗斯多维斯·博夫和乔治·皮克斯利来说，“今天[新自由主义]的神学地位正如一股对伟大的上资资本盲目崇拜热潮的神学地位，很多较小的神的创造者和父亲：金钱、自由市场等等。”（1989:144）就像大多数宗教信条一样，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释的公告既不能生效也不能作废，但通常都会被不加怀疑地接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机构所使用的道德标准并不以道德的观念为基础，而是以经济的解释原则和该机构积累的权力为基础。这一点通过高盛国际的副主席兼英国上议院成员——布莱恩·格里菲斯的一段陈述得到了最好的解释，他说：“基督徒应该对贫困回应什么？首先，通过鼓励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私有化国有工厂来支持全球资本主义，开放他们的经济来支持贸易和投资，并且允许竞争性市场的发展。”（2003:171）

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市场的力量比道德标准更重要，即使当市场造成普遍的饥饿和贫困时。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的确，自由（市场）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给个体留下道德标准的问题让他们去努力克服。”“真正”重要的道德标准问题是那些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对一个个体——问他应该用他的自由做什么？”（1962:12）

任何关注个人与个人信仰和救赎的问

题给基督教伦理学家提出了问题，尤其是那些从事保证金的伦理学家。丹尼尔·贝尔最终搞清楚了这种新自由主义对道德标准的态度，资本主义在奥古斯汀的名言里放置了一个新的转折，“爱并按你的意愿去做。”现在把它变为，“为市场生产并按你的意愿去做”（2001:18）极少数人对利润的追求通常会给很多人带来不足。像秘鲁解放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坚持主张“在《圣经》中，物质的贫困是一种低于人类的状况，是非正义和罪恶的产物。”（1984:54）于是在这里，新自由主义和解放的福音消息之间矛盾的症结是“新自由主义缺少一种总体的道德标准观点，因为它将道德标准归纳到个人主义的领域。”

群体道德标准与个人道德标准之间的对立或者说市场力量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对立允许基督徒将市场看作是一个“上帝”。然后，市场决定人类的命运并且人类为市场而存在。财富的最大化成了一种美德本身，同时也是它存在的一个原因，并且通过比赛分出优劣。经济上的“失败者”是由他们在正确地经营自己生活方面缺少个人道德标准所造成的。没有被雇佣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中最大化某人的智力方面道德责任的瓦解。

跨国公司也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方式消除竞争者来竞争，这么做经常会导致失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减少了对手工劳动者的需求，人们成为非必要的，非本质的多余群体。尽管人们对原材料有大量的需求，但世界2/3的人口已不再被需要。

新自由主义趋向于包揽和支配人类生存的每个方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市场之外的领域存在。即使减少与跨国公司建立同盟关系的公司在国家的数量。每一个东西和每一个群体都降低为消费品。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上没有竞争力，那么，被称为“结构调整”或者“财政紧缩方案”的按财政优先顺序排列的过程就会发生，以便该国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玩家。这通常以该国的人口为代价，而他们的生活条件也会变得更糟糕。

质疑新自由主义的那些人不必反对全球化，它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现实。他们非常反对对定义全球化的方式。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新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秩序给全人类，尤其是被边缘化的人带来了消极影响。然而，好消息是上帝习惯上说反对历史上的帝国，最后，考虑到巴西前任大主教赫尔德·卡尔内拉所说的话：“当我给饥饿的人食物时，他们称呼我为圣人，当我问他们为什么饥饿时，他们称我为共产主义者。”任何适合废除全球不公平的道德标准实践必须从这里开始——通过问为什么人们会饥饿。除非我们在第一时间解除他们所有的不幸和遭受的经济非正义，否则我们不会开始处理世界的被边缘化的解放问题。

（上接第1版）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更加可持续和可修复。工业化农业提供不了任何一个这样的益处，但农业生态学却能满足这些要求。

## 为都市农业留下空间，发展或重新引进集约化菜园

引进农业生态学 and 摆脱工业化农业运动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城市背景下正在发展或重新引进集约化菜园的运动——尤其在低收入地区，在那里人们不大可能得到新鲜食物（这被称为“食品沙漠”）。一个贯穿美国的运动在于重新制定当地的食品网，它已经引导了当地的农民市场和城市的菜园，这些包括利用集约化的菜园为在农民市场买不起新鲜食物的低收入者提供帮助。换言之，为穷人去做人们有史以来直到最近在做的事情留下空间：为自己种植食物。很多低收入者已经知道怎样种植食物，或者他们的父母是如何做的，而且能够利用城市空间，如社区花园。很多人处于半失业或失业状态，他们乐意有机会去做这个工作——而且可以通过为当地市场种植新鲜食物而获得收入。

威尔·艾伦，因他在密尔沃基城的城市菜园而著名，他证明集约型的城市农业可以高产，并为半失业的人们提供很好的工作以及非常健康的食物，还能使枯萎的城市地区恢复生机。他使用了农业生态学的方法，例如“垂直”种植，这种种植方法可以在带着高屋顶的废弃仓库里种植食物，可以把鸡放在温室里取暖并使土地肥沃，也可以用蠕虫加速堆肥过程，并制造适合多块种植的土壤。他现在正在“升级换代”所有的这些方法，还与密尔沃基城合作，以利用大量的有机废料作为堆肥和化肥，所以，他们对城外的需要越来越少。

在芝加哥这个大得多的城市，有一项政策是要求所有的新建筑拥有“绿色屋顶”——屋顶上覆盖植物。这项政策还提示我们，城市可以把农业并入他们的公共建设。绿色屋顶大大减少了水分对建筑物的破坏，同时减少建筑物的吸热效应，这就意味着建筑物会降低能源成本，同时降低城市的温度。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有一家新的公立医院（为没有保险的病人，也就是低收入者服务）在他们的屋顶上有一个“空中农场”，这个屋顶现在可以为病人提供新鲜的蔬菜，同时它成了一个病人在康复过程中可以欣赏和学习怎么利用新鲜食物的地方。

当世界上的大部分城市在迅速发展的时候，乡村地区却在衰落。这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半失业和失业问题，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工业化农业曾试图通过从小块土地耕作转移到工业化耕种大块土地，以面对失业问题，这样做是为了给城市和出口提供主要的原料而生产。通常是政府提供补贴为高昂代价来支持他们不能负担的部分，然而政府不能掏腰包去养活它们庞大的城市人口。这种方法没有解决问题，只是通过使更多的人口远离他们传统的土地并强迫他们进城而使问题更糟，因为城市并不能发展得足够快以吸收他们。农业生态学既可在乡村地区，又可在城市地区应用，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乡村地区利用农业生态学可以稳固乡村共同体，同时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和收入，提升土地和人们的健康水平。

总之，“养活世界”最好的方法是支持每一个共同体，依靠本地的和自然的资源去养活自己。

（作者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国家财富还是健康：从内部批判资本主义》一书作者；译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马黎明）

## 有机马克思主义——21世纪社会环境哲学（下）

[美]克利福 柯布 潘旋译

## 将有机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实际问题

虽然在没有任何关于这一新哲学性质的一致性意见的情况下，运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去解决实际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大可以通过认真思考它将如何在当代环境中发挥作用，以了解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我要谈论的问题是“腐败”，这是一个跨越政治与经济界限的话题。目前，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将腐败归结于个人的原因或政治派别竞争的原因。在许多官员利用公共权力来获得私人利益的同时，只有他们中的少数人被当众斥责和惩罚。这些罪责之人被撤销官职，有时也会被送进监狱。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政党也会受到攻击。这种公共戏剧可以有效地制造一种宣泄（一种戏剧性解决方案的感觉），但这根本不能解决首要导致腐败行为的潜在问题。

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审视腐败问题，我们马上就要面对一个令人困惑的局面。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它在西欧是很常见的，贵族公开贿赂政治官员。现在被视为犯罪的行为一度曾被认为是正常的、合法的。过去的例子告诉我们，腐败只存在于一种与合法的文化规范的相互关系之中。即使在今天，腐败在不同的文化中也有不同的含义，即使在同一文化中也可能没有明确的定义。举例来说，在中国，收取礼品或请客吃饭作为一种表示尊敬或社会关系的象征，是一个很正常的程序，但这对于一个多疑的外国人来说，可能会称为一种腐败，即使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这是正常的、适当的行为。但村里的农民可能会认为村干部腐败，如果他们强迫普通人用大量的礼物来交换基本服务。在某些时候，一个光荣的体系分解，变成一种耻辱的象征。即使送礼是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平等主义精神现在也成为了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每一种文化中都出现了同样的歧义。在19世纪，政治庇护体系是很常见的。例如，城市就业机会按政治主张而授予不同的人。到了1880年代，这种行为被视为是严重的腐败。历史学家也开始重新评估这一判断，通过承认“城市老板”体系既有腐败的因素，也有效率的因素。在19世纪，美国的很多城市缺乏对资本项目的法律授权，因此就不得不伴随着私人的利益来实现公共目的。这种结构性限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当地政客在处理公共事业的过程中中饱私囊的情况。但这并不是个人的缺陷。这是一个失败的制度，不与富有的商业领袖交易，而阻止城市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怀疑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地方政府，因为同样的原因，地方政府在中国有着有限的法律权力。当腐败达到一定的高度，正常的逻辑会说，中央政府应该减少地方官员的权力以防止其滥用职权。但是，美国历史上的证据表明了一个悖论，对腐败的地方政府授予更多权力实际上可能会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这是一个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先前曾指出，这种方法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大城市的老板们实施了另一种形式的腐败，这在美国、抑或每个国家都在继续。G·W·普朗吉是1850年至1900年纽约市的政治机器领导，他将此描述为“诚实受贿”（雷奥登1905：3-10）。“受贿”是官员腐败的另一种说法，但这种行为并不违法。普朗吉购买土地并持有它，且知道它会升值很快，当城市项目开始运行，对土地的需求必将大大增加。他的批评者们眼看着他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成为了百万富翁，他们假设他是在从财政部偷钱，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靠运用内部知识，开发房地产市场而赚了钱，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因为他的腐败是间接的、合法的，他的批评者们也不能证明他做错了什么。

在那时，那些想要改革城市政府、让它“干净”的人们是富有的商业领袖。他们通过告诉公众他们将终结腐败，而被选为城市官员。但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消除普朗吉所谓的“诚实受贿”，因为富裕的商界领袖也在从土地投机中获利。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防止这种腐败。他们将不得不对土地价值征收高额的税收，这将降低土地价格，然后攫取土地投机的大部分收益。既然这样会损害富人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不会阻止这种形式的腐败了。一个世纪前，你会发现可能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唐纳德·川普，他的财富是基于现存纽约土地市场腐败的基础之上的。房地产税从来没有高到足够干扰这场财富与权力的竞赛。当然，总会有一些官员进行小规模腐败，接受几千美元的贿赂，做出一个有利于某人的决定。但是，大数额的钱——涉及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总是在房地产方面，并始终合法。

即使这种腐败每天都在公共视野内发生，它仍然

是政治生活中最大的秘密之一。它仍然是秘密，因为很少有人关注体系问题，使之成为可能或控制它的方法。事实上，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都在从事同样的过程。在中国，有着广泛的认知，唯一的、安全的剩余资产投资就是在房地产方面：即第二个房子或是第三个。因此，在大城市里，多达一半的住房单位坐空。这是一种集体腐败的形式，但涉及其中的人们并不想看到它结束。

政府按土地价格征税的失败也促进了另一种腐败：有组织的犯罪。由于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城市地标可产生盈余，以较高的土地价格的形式展现出来，当地罪犯需要到附近的成功小企业的拥有者手上收取“保护费”。如果他们收不到钱，罪犯就会伤害拥有者或烧毁建筑。从企业主的角度来看，支付保护费只是在付另一种税。如果城市或国家征收高额税款，犯罪集团将会有可能减少。一如任何好的长期掠夺者一样，罪犯们知道他们只能攫取企业的盈余。如果他们企业运营的必要资金全部拿走，企业就会破产，他们也会失去他们获取金钱的能力。因此，提高土地价值的税收，不仅可以减少富人中高阶层的腐败；也可以减少或消除犯罪团伙的勒索计划。

这个问题以及一系列的关系不是纽约特有的。它是普遍的。对土地价值征税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腐败和犯罪。如果政府不收集土地方面的剩余价值，那么，像川普和黑手党头目那样的亿万富翁们就会闻到血腥味，然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榨干那些牺牲者。这一流程发生在任何地方，包括中国。虽然在中国土地是以租赁权形式存在的，而不是以所有权的形式，但其实一个70年的租赁效果等同于一个50年或60年的所有权。中国政府可以要求每五年就以新的市场利率更新租约，也可以对所有的土地（包括租赁的土地）征收至少5%的房产税。无论是哪种方法都会降低土地的价格，以减少与土地相关的腐败和犯罪。（我没有证据证明在中国有“保护”计划，但我可以基于世界各地的经验，预测其存在。）

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土地征税的一些社会效益。在中国有一个广泛的共识，腐败与房地产市场关系密切，但迄今为止，政府做得太少，只是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系统来监控问题，而非真正的解决问题。国家房地产登记处将大大简化国家审计署目前的

任务，并刚刚在房地产部门展开了一项全国性的腐败调查工作。在目前的情况下，官员们已经很容易地就可以占有农村居民的土地，用以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可以用作抵押品，通过当地正度的融资工具来抵制贷款。一些官员也使用贿赂或挪用公款所得的收入去购买房地产。这两种类型的行为都将在持续进行的反腐运动中受到审查。（Hsu2014）

这个故事告诉我，中国中央政府对“诚实受贿”体制的反应，与100多年前纽约的改革方式大体相同。即使中央政府承认，早在2010年，房地产税在除了提高收入以外的其他方面就已显现出相应的社会效益，但迄今为止，甚至仅计划征收1%的税都以失败告终。仅仅1%的税对腐败的程度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或许3%的税（这将降低土地价格的近50%）才是会产生明显差异的最低税率。

## 结语

在本文中，我只触及了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方法，这可以通过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合作来加强。重要的是，平等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被保留下来并进一步发展。但历史的发展已经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分析的一些元素的永恒问题。自马克思本人将知识视为历史和文化的偶然事件以来，他或许会同意他的哲学需要一些修订。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并不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要素。在某些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重申了马克思的概念，历史通过斗争而发生发展。然而，如果两个传统融合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阶级之间的斗争仅仅成为发生在自然和社会之中的更大的戏剧之中的一小部分，其结果往往是令人沮丧的。物质力量继续冲突，但思想也是有争议的，沮丧可能不会导致思想的扩大化或深化，而是狭隘的规约性和碎片化。知识连贯性的丧失不断发生，不仅是因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胜利，而且也因为哲学、政治理论、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的自主发展。因此，如果我们要发展智力能力，以展望一个社会性的反应和机制的整合，那么很大的一个需求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注入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范畴。

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不只是物质方面的疾病、洪水、干旱、经济不稳定和社会的不平等。现代社会，包括美国和中国，都在经历一个高（下转第3版）

## 重游阿柯圣地——纪念生态建筑之父保罗·索拉里先生

梅 君

阿柯圣地是现代建筑之父赖特的学生、生态建筑之父保罗·索拉里（1919-2013）创建的一个城市实验室。上一次访问阿柯圣地是四年前的事了。记得四年前（2013年），保罗·索拉里已经九十三岁的高龄了。尽管他的健康已经不如以前，但仍抽出时间愉快地接受了随我们一同前往的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我们大概是他生前所接待的最后一拨中国人了吧。

阿柯圣地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北边的迈耶市（MAYER）。下十七号国道不久，即进入阿柯圣地，土路入口处写有一块牌子，城市实验室（urban laboratory）。

阿柯圣地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正是美国梦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不过，索拉里这位赖特的弟子可没有沉湎于这个建立在车轮和石油之上的梦幻之中，而是众人独醉吾独醒，洞见到此梦不可持续，开始思考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如何可能，并在凤凰城北面的一个荒漠里买下八百英亩的土地，建立了阿柯圣地，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四十多年来，他一直是建了拆，拆了建，力图打造他心目中的一个理想之邦。城市实验室确实名符其实。试想，哪一个市政府会允许城市永远是一个大工地，没完没了地修修拆拆。只有在如此的荒漠里，索拉里才能自由自在地上下求索。难怪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才完成了当初设想的百分之三。当然，以他一人之经济实力，要修建一座容纳五千余人自给自足的城市，谈何容易！更何况阿柯圣地所在的迈耶市，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全市也才只有1408人，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为70人。

阿柯圣地（ARCOSANTI）在英文和意大利文里指的是反物质的建筑（anti-material architecture），这一点恰是索拉里的一贯主张，他一直认为一家一栋（SINGLEFAMILY HOUSE）是一种罪恶，因为浪费的材料太多，且太个人主义，人与人之间没有沟通，更别说人与自然的沟通了。而他的建筑，要体现的恰恰是“通”。此次再游阿柯圣地，对此深有体会。玛丽给我们安排的房间据说是索拉里的客房，当天晚上，我们便发现原来它与玛丽的办公室只有一门相隔。第二天更发现，窗户的对面正好是原波士顿建筑学院院长、现阿柯圣地新任主席杰夫的办公室兼卧室，从窗户再往下一看，原来就是阿柯圣地的办公室。更有趣的是，晚上我们转来转去的迷了路，在办公室里碰见杰夫，他竟告诉我们，那边有一架梯子，爬上去正好是玛丽的办公室，穿过办公室就可到达我们的房间。并说当年索拉里就是这样爬上爬下的。想来这位当时的新任主席现在天天也是这样爬上爬下的吧。因为他的办公室兼卧室也是在二楼。

阿柯圣地的建筑带有明显的索拉里特色，就是穹拱和圆形用得最多，空间很开阔，采光很好，由一个小小的公寓组成的圆拱形建筑，气势恢宏。从各个门出来后，中心竟是一个观星剧场，在波市住久了，如此近而亮的群星灿烂得真是难得一遇的仙境呵。于是不顾早春夜晚的寒冷，抱着一条毯子躺到了剧场的台阶上，仰望着璀璨的星星，享受着难得的安宁。

不喜欢安静的人，也有自己的去处。在巨大的穹顶之下，正是一个城市广场，在这里可以有信息的交流，也可有体育与文娱活动，一些音乐爱好者面对着对面的平顶山（MESA），已经迫不及待地弹起了吉它。追随索拉里四十多年的美籍日本建筑师Tomiaki Tamura指着下面的一个地方告诉我们，那里的平台正好可做一个舞台，晚上如将灯光打它背后的山上，人们在灯光变幻无穷的舞台上载歌载舞，何等的美妙呵。

城市广场的后面，据说是未来的商铺一条街，手工艺人可在那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附近则是城市的工具储藏室。索拉里的设想是，哪里用得着每家每户都弄一套工具！人们如想动手做点什么，在这里总能发现他们需要的工具。如此一来，又是一种节约。这里还有一个公共游泳池，同样体现的是索拉里的分享观念。何必要每家每户一个游泳池，有些人一年四季也不见得游多少次，但维护清洁却所费甚多，实在是资源的一种浪费呵。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外面阳光明媚，正好去周围探险一番。这可是以前来这里没有机会做的赏心乐事呵。放眼望去，阿柯圣地的主建筑之外，是绵延不绝伸向远处的平顶山（MESA），山下有小河流过，不过，它大部分是在地下，沿着山间小道走向深处，竟不见一人，远远的似乎有牛声，鸟声与风声，一片天籁。正是初春之时，太阳暖暖在照在小路上，人心也是暖而满足的。小河的另一面，除了野营地以外，还有大片的牧场。据Tamura说，阿柯圣地将周围约四千英亩的牧场从州政府那里长期包租下来了，因为要的就是这一片原汁原味的自然美景以及未来的农业发展潜力，一座五千居民的城市，当然需要周围的农业来养活，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支持的就是当地的经济。更何况这里已经没有城里城外的差别，居民们享受着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欣赏田园风光，自然野趣也不用舟车劳顿，出门即可，甚至不用出门，自然美景就实实在在地在窗前。

阿柯圣地的食堂也令我们印象深刻。据说主厨的是一位意大利颇有名气的电影制片人的女儿，所以，食物带有地中海的风格，豆子用得最多，沙拉很新鲜很丰富，看起来色彩缤纷，清爽之极，令人顿时食指大开。过去儿子一直批评我们的中国胃不向其它食物开放，但在这里，我们却实实在在地爱上了这种西式食物，既好看，又可口，更健康，两天吃下来，我们的中国胃居然不仅没有反对，反而喜欢上它了。用餐是自助餐式，每每选好食物，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或是坐在外面的阳台上，面对窗外阿柯圣地独特的平顶山美景，享受着美味佳肴，不禁心中悄悄的问自己，人生何处是天堂？

索拉里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因设计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桥在国际建筑界声誉鹊起，50年代中期他从意大利回来后，定居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市（Scottsdale），并在那里创立了一个非赢利的教育机构：坎圣地（COSANTI）基金会，从此开始了

他的生态城市的设计研究与实验。坎圣地（COSANTI）由两个词“COSA”和“ANTI”构成：COSA在意大利有特质、事物之义，ANTI即反对，合在一起即反对物质。再在这个新词的前面加上AR（建筑的前缀）即成阿柯圣地（ARCOSANTI），意指反物质主义的建筑。由此可见索拉里对现代美国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深恶痛绝。

始于1970年、占地八百英亩的阿柯圣地（ARCOSANTI）就是坎圣地教育基金会的主要工程。同时索拉里又用“architecture” and “ecology”新造了一个词arcology，即生态建筑。从那时至今，索拉里已经坚持了四十多年，他抗拒着美国现代梦的索拉马龙，一头扎进亚利桑那的这个荒漠中，埋头精雕细刻他的生态建筑的设想，阿柯圣地，这个雄心勃勃的城市实验完全靠出售著名的索拉里风铃获得的资金及个人捐献支撑。索拉里深知，阿柯圣地很难获得财大气粗的资金支持。因此他反对的恰是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汽车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他说，我们向社会提供的东西，社会现在并不打算接受。

是什么支撑着这个小小的意大利人如此执着于这个生态建筑的梦想，以至于不惜倾其一生所有，在亚利桑那的这个荒漠中一呆就是五十多年？

从索拉里的著述中可看出，他受德日进的影响甚大，在他的著作《精神的花园》（THE MIND GARDEN）中，他认为德日进给予了他一个新的视角。他尤其对德日进的复杂性概念十分感兴趣，并进而认为，复杂性离不开简约，简约就是复杂。这两个概念是互相依靠的。简约是达到复杂性的工具与手段。“COMPLEXITYAND MINIATURIZATION ARE ABOUT TURNING MORE AND MORE OUT OF LESS AND LESS” .P.36) 人的生活就应该用更少创造更多。他的简约瘦身城市的模型就体现了简约与复杂二者的完美结合。

同时，在这本书中，也可看出索拉里对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并不陌生，他娴熟地运用着“生成”、“过程”、“有机体”等术语，他认为，机械主义与有机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机械主义是由外在操控的，而有机主义却具有自我决定的能力”。人作为一个有机体，一种生命的形式，总是处于自我创造和追求新奇的过程之中，他不承认有一个外在的创造者或上帝。因此，他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认为这种二元论是荒谬的。难怪他是怀特海哲学第三代传人小约翰·柯布博士的好朋友，曾多次来到克莱蒙。我们虽然来自遥远的中国，也因柯老与他结缘，谁说世界很大？

从有机哲学出发，他认为，每一个有机体都有自己的外壳，都生活其中，所以，尽可能地保持这个外壳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有机体就可能存在下去。有些人认为，这个生命的外壳就有机体与外界隔绝开来，但索拉里却认为，这个外壳并不是有机体与他者的隔离物，而恰是有机体与外界相联系的一个通道。有机体应该住在鲜活的外壳里，将这种有

机思想运用到城市设计里，就形成了城市设计的有机观念。也就是说，在索拉里看来，城市应该是有生命的，而不是一座死城。这也是为什么索拉里高调地反对着我们今天居住于其中的这个魔幻般的世界，因为它将人与外界隔绝开来，并造成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对自然带来致命的伤害。而阿柯圣地所做的则是这样一个尝试：将建筑看作一个有机体，它是活的，各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并依赖的，形成共生共荣的局面。

阿柯圣地并不是为个体修建的，而是为共同体修建的。他说，文明就是对我们生活的集体艺术的衡量。“正能量来源于自我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深度和谐”。而现代建筑界的趋势则是为个人主义、为隐居而建，这是致命的。许多人认为有车就可以解决这种现代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但索拉里认为，这种念头是很疯狂的。他希望有一种第三条道路以取代目前这种令人发疯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倾向。他提出的简约瘦身城市观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一些人片面地认为，索拉里反对私有财产，其实不然，如他自己所说，他反对的是那种认为私有财产是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最好方法这一信念。他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

索拉里认为，人要求自己所有的空间，这个空间远大于公寓或家的概念。索拉里说，他小时候住在意大利的托里诺市，他父母从来都是租房住，但他感觉整个城市都属于自己。因为那是他的环境。整个城市对小小的索拉里来说都是有用的。如果城市对自己的居民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城市也就塌陷了，成为一个贫民区。

索拉里并不是一个沙漠中的隐士，他也利用可能的机会走出去宣传自己的生态建筑的理想。1970年由华盛顿美术馆举办的地标展览：“保罗·索拉里的建筑远景”，并在美国及加拿大巡回展出（A landmark exhibition, “The Architectural Visions ofPaolo Soleri.”）引起破记录的关注。1976年，纽约施乐广场中心举行了“两个太阳的生态建筑：未来城市的概念”（“Two Suns Arcology, A Concept for Future Cities”）的展览。1989年，“保罗·索拉里的栖息地：生态细节”（“Paolo Soleri Habitats: Ecologic Minutiae”）及其生态建筑，空间及桥在纽约科学院展出。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最初的几年，人们似乎忘记了他，但21世纪，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逼近，这个沙漠中的预言者再次引起世人的极大的关注，通往阿柯圣地的道路如今已被命名为阿柯圣地的路牌，在17号国道上，阿柯圣地的路就出现在263号出口的路牌上，在阿柯圣地附近的高速公路桥两边，则镶嵌着带有索拉里风格的抽象色彩画，那飞扬的色彩，连同阿柯圣地那巨大的穹拱建筑，那些日益增多的朝圣者及实习生，都在述说着一个事实：索拉里回来了，连同他的生态建筑的梦想！

（上接第1版）伦理的说法那样，我们必须允许我们因他人的遭遇而备受煎熬，并受到精神上的伤害。就像他引用的犹太法典说的那样：“不留食物地抛弃一个人是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减轻的罪过；自愿和非自愿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并不适用。”（Levinas, 1979, 201）。换句话说来说，我对于自身生活方式造成了他人的饥饿和痛苦的无意识并不是借口，错误仍然存在。（因此，气候正义理论学家谈到“碳债务”时指出，像我们这样的污染者亏欠那些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而遭受健康和生存方面损害的人，无论我们是否知道，都是这样的）。Levinas说：“在人们饥饿之前，饥饿都是‘客观的’；这是不可辩驳的”。他经常引用Dostoevsky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一句话，“我们对于种种过往都有罪责，我比其他人的还要多。”即使是来自外部的创伤也不能为推卸责任的心理开脱。这只会导致目睹他们的邻居被装进车厢带走的人表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是如此，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特别是我们的特权使我们的同胞的生活变得贫穷，受到危害。

然而，受到了外在创伤的麻痹，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我们的内疚和责任。或者，我们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巨大舆论压力所压垮，发觉自己仍然和从前一样。Robert Stolorow（2013）推测无效的结果：

逃避的解释需要一个从哲学到精神分析学角度的转变，以此来强调这种逐渐丧失意义并伴随到世界末日的难以忍受的情绪。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对于世界末日的恐惧，使轻视者、嘲讽者离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远离气候变化的威胁的过程中，我们正为我们所逃避的可怕的灾难做贡献。我们必须在对我们的后代来说为时未晚的时候正视世界末日的焦虑。这样就要我们开启一场深入的情感对话，以此让我们共同承担这份焦虑。

他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一场“深远的情感对话”？“现阶段之急迫性”（King, 1967）使我们许多人都担心：当我们醒来，世界上将有数以百万计的贫困人口死于饥饿，全球变暖的最坏影响可能是无法补救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保持对话，以此帮助我们哀悼，与此同时，忍受使我们麻痹的焦虑。

历史的无意识和看不见的礼物：  
殖民主义和奴隶制

关于美国殖民主义的历史无意识的沉默，忽略我们对奴隶制和种族统治罪行无知的人，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不能真正意义上严肃应对气候正义，直到我们直面这400年的历史。这是我的论文。它控诉曾经是有罪的和有责任的“我”，但是，将这个问题放在一段共同的历史和描述的无意识中，就变成了这样的“我们”。所以，让我们想象出一个栖息在我们道德无意识中的幽灵。虽然就像Descartes和Locke想的那样，知识的鬼魂可能会造成麻烦，现在我们考虑要掩盖历史的罪行，也就是我们集体的鬼，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无意识的，美国的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特别是在美国，是建立在人类平等的明确理想。我选择了殖民主义和奴隶制来说，因为我们延续了二战后隐藏罪行的习惯，这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气候变化对那些看不到他们生活的人的影响。

在北美洲的历史，在我写作的地方，根据首先被西班牙和葡萄牙引用的Terra Nullius的学说，由英法两个国家开始争夺一片无人的土地。然后是年轻的美国，以其“显化的命运”，同时通过一个幅员辽阔的加拿大，摧毁

土著人民。比起美国，加拿大似乎最近更大程度上的承认被我们称为“印第安人”的美洲“第一民族”的身份。殖民主义不仅仅像英国管理印度殖民地那样，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拿大以及后来的美国，他们通过傲慢地方式取代了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土著人，就好像那里的人怎样活都无关紧要一样。Judith Butler（Butler 2010）认为这些人被视为“不会悲伤的”。我们把自己称作“一个移民国家”，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奴隶制被称为拥有、买卖、继承及强迫劳动的系统，通常是以极端暴力形式展开的，特别是在15到19世纪的非洲奴隶贸易中。对其他形式的奴役，包括那些纳粹和苏联集中营中的，以及童工的形式，性奴隶——不可言喻的谴责他们，因为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痛苦，这些形式不在这里直接讨论。我的观点是，奴隶制这种一种“特殊制度”组成了美国宪法，赋予南方奴隶主极大的权力，牵绊我们到了道德意识接近于无的这一天（Davis 2006, Butler 2009）。弗洛伊德教会我们我们所不知道的，真正影响深远的以及个人所懂的，我们必然会去重复。连同殖民的历史我们都分享，这个我们鲜少提及的奴隶及其持续的影响的历史，而我们很少提及，使我们感受到碳和甲烷喷涌的使用的生活方式在使全球变暖的痛苦。历史在不断重演。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段历史直观的在最近的电影中成为真实的，《为奴十二年》这部电影使我们认识到，大量的人权侵犯并不仅仅发生在例如德国、奥地利、智利和南非等地。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从历史的延续和危险系数（Butler 1990）中而来，像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种族主义和TA-Nehisi Coates呈现给我们的那样。在他给儿子的信中，他提醒我们：

……奴役不是一个比喻的。这是诅咒。这是永不停息的黑夜。这黑夜的长度就是我们历史的长度。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个国家被奴役的时间比我们自由的时间要长。永远不要忘记，250年前，黑人出生在食物链之中，一代又一代，对除了食物链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第70页）。

事实上，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欧洲和北美洲，尤其是在美国，正在经历一种复杂的优越。这样一种“复杂”症状可能包括1）我们偷走了原住民的土地，仅仅因为我们从上一个“拥有者”手中购买了它，这样一个症状；2）我们认为自己是白人，做的事都是对的，这样一个症状；3）我们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该去学英语，而我们没必要去学西班牙语或其他广泛使用的语言，这样一个症状；4）我们一般不敏感的傲慢和优越感，容易沦为暴力对付那些我们认为较差的人；5）不能想象自己处于那种在他们面前我们有优越感的人所处的困境，因此减弱同情和怜悯；6）有这样一种观念，地球是属于我们这些所谓的白人的，而对于其他人而言，“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我们的经济利益；挖掘我们想要的或需要的矿物质，给我们缝制便宜的衣服，在低于贫困标准的工资条件下工作等等。这个复杂的嵌入式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和无形的，它形成了一个生命之网，使那些携带它的人感到舒适，同时却也在给我们剥削和压迫的人带来死亡和愤怒。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人性正在经受它的煎熬。（未完待续）

冲绳是处于太平洋中的日本的一个自治海岛县，由诸多具有异国情调的珊瑚岛所组成。虽然它的GDP不高，在日本属于“垫底的”，但其幸福指数却居全日本之冠，远远高于东京，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可名列世界前茅。著名生态哲学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会会长柯布博士常常用冲绳的例子来诘问GDP崇拜，老人试图告诉世人，GDP高不等于幸福指数高，GDP低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活的不幸福。而幸福的人往往长寿。

来到冲绳，你会发现那里不仅居住着世界上最长寿的人，而且他们也是最健康、最幸福、最活泼的百岁老人和超长寿老人。

这个长寿天堂80岁和90岁的人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比赛活动，组织各种有氧运动组会议，在令人愉悦的聚会上，他们欢呼着，舞动，歌唱着。

1975年，声称铃木博士的一位日本医生来到冲绳县并创办了一个医疗中心，而且还寻找了曾经他所听过的一位出名的百岁老人。他决定去询问这位看上去大约70岁的老人，随后，他沿着街道大步走过去问道，是否知道百岁老人住在哪里。你可能会猜到她的回复：“我就是。”她说。

铃木博士在这个小岛上陆续找到了40位百岁老人，并发现他们不仅数量众

多而且非常健康。当今，相比之下，美国每10万人中，有10位百岁老人，而且大多数中年年龄在105岁以上的及其罕见。但冲绳县每10万人中却有34位百岁老人。不仅如此，而且冲绳县人就西方致命疾病（即目前存在的心脏病、中风以及癌症）的患病率是处于最低水平。

随后，铃木博士和老年医学专家研究了年长的冲绳县人，发现他们拥有反常的年轻动脉，较低的疏基丁氨酸水平，较高的性荷尔蒙水平，活跃的免疫系统，极好的骨骼健康，以及一流的思维敏捷性。许多上了年纪的冲绳县人声称他们的生活永无疾病，只有在最后死亡的前几个月时，往往才会生病。

研究者也发现，对我们平凡人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然而，冲绳县人的长寿秘诀与其说是由基因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其健康、规律的饮食以及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所决定。冲绳县关于百岁老人的研究已聚焦600位，得出的结论是，就饮食而言，他们是以植物以及从鱼类和发酵的大豆制品中获得的一些蛋白质为主，呼吸新鲜空气和晒太阳成为他们大量的户外运动，他们关闭一切社交网络以及拥有强烈的精神信仰，成为了他们延长青春和具有非凡的活力的秘诀。

（上接第2版）程度的犬儒主义和绝望，这往往被过度的乐观所掩盖。这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人类将会在几代以内成为灭绝的物种。然而，所有需要改变的机构都陷入僵局。很少有社会会为公民提供参与有意义的改变的途径，这可能会使得今后50年的生活质量有所差异。综上所述，现今所需的改变是一种人类精神的转变，在更广的社会层面逐步灌输一种冒险的意愿，以及为后代的利益而做出牺牲。甚至当个人有愿望采取行动时，他们能够找到一些释放能量的地方，而非无意义的消遣。

有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可以履行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既能激励人类，也能激励制度，去采取行动，并提供关于采取何种行为的具体思想。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传统是需要被尊重的，而不是被敬畏的。为了有效地指导新一代的努力，旧的传统需要通过与其他传统的对话来进行转变。如果我们成功地重塑传统，以满足新的需求，我们就可以为青年一代提供一些值得敷衍的东西。如果我们期望下一代自己解决这一切，他们将没有选择，而只能继续在业已奠定的灾难性道路上继续前行。构建新的历史、自然和社会哲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希望我们能携手合作，来检验有机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进程中是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全文完）

（上接第4版）和更高的能量寻求帮助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如何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我和丈夫有着直接的经验。我们曾经都对对方感到非常愤怒，并且在某个重要问题上顽固地互不相让。他紧抱着自己的观点不放，我对自己的意见也毫不动摇。我们之间像是横着一条无法涉渡的河流。每当我们尝试着沟通时，我们不过是更加坚持自己的观念而已。我们的绝望感在持续增长。忽然，我想到要去寻求帮助，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内心，并且向上帝寻求指引。“如果这段关系是为了让我踏上更了解自己以及与您相通的道路，我需要您的帮助”。当我把注意力从重申自己在争论中的立场，转向内心关照并寻求上帝的帮助时，我丈夫马上来到我跟前，对我说，“我感受到了。”他能感受到我转向了我的内在并开始弥合令我们分隔的裂痕，这让我吃惊。他是怎么发现的呢？他又怎么知道的呢？无疑，这看似的神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也渴望更亲密的关系，并且也以转向内在的方式来寻求帮助。

我们的祈祷同时得到了回应。那种深层能量联系带给我们的感受，比我们从站在各自立场上争论获得的乐趣，要好得多。与他者的真正亲密关系是由坦诚地探索、联合、敞开而创造的。人类的意识有很多层次，因此，与他人一起进行探索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也因此，我们获得欢乐和喜悦的机会也是无限的。

*任何能够激怒我们的涉及他人的事情，都能引导我们了解自我。*——卡尔·荣格

实现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真正需求，需要付诸全身心的努力。关系总会制造出激发某种恐惧的条件。爱与惧是推动我们的两种相反的力量。当这两种力量被认识到，被接纳，并且被坦承式的交流，它们将开始把我们推向同一个方向，指向联合与爱的方向。（未完待续）

將靜觀帶入你的生命中 (十六)

東南大學 孫志海 博士

在你读完本部分之后,无论你过去是否学习过其他内观、觉察或之类的修心方法,我都建议你先按我说的方法认真练习一段时间,最好时间长些,比如3个月时间,等感觉自己练习得很熟练了,再继续阅读第二部分。当然,有些人可以很快学会,并很快体会到静观的妙处。人和人虽然从根本上是完全一样的,但现实状况则相互之间差别巨大。第二部分的文字更多的是理论阐释和深入静观所需要的一些提示,如果你没有坚实的静观经历,这些理论你是很难真正理解和接受的,甚至会心升反感的,那就可能把你耽误了。当然,那些深入静观所需要的提示,也只有在你学会静观并认真进行过静观一段时间之后,你才能看懂,才会有用。

为什么我建议那些已经学习过静观的人,比如学习过佛教的内观的人,也要先按我所说的方法先静观一段时间呢?如果你看懂了我上面的文字,我想你应该发现,我所说的静观与佛教所说的内观、奥修所说的觉察、克里希那穆提所说的觉知等,都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些差别在文字上看好像不大,但在实际效果上却是本质区别的。我这里把做法上的区别概括一下,供你参考。

1、无需做任何外在准备,随时随地都可进入,这样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静观,也就是说,你随时随地都在修炼。但我们并不要求你保持静观状态,因为,如果这样,你的那些潜伏的观念就不能跑出来,你就无法清除它。

2、每次静观都仅是一次性动作,当发现自己有情绪、大脑被一个观念控制时,或身体不舒服时,才去静观,静观结束后,就不管它了,想干吗干吗。所以这种静观是完全自由的,不会对你的生活、学习造成任何干扰,更不会让你出现惶恐恍惚的状态,或精神叨叨的状态。你的外在行为表现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差别。至多是在你静观时需要把眼睛闭一下。我们不要求你一直保持觉知状态,当然随着你执著心清除,你的大脑会越来越纯净,到一定时候每一丝情绪的升起,每一个念头的掠过,你都清清楚楚,并随时进入静观程序,将其清除。但问题常常也会在此时出现,很容易把觉知变成思维意识的觉知。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如果是后天思维意识的觉知,大脑中会存在一丝紧张感。所以,一旦体验到这丝紧张感,就需要立即调整、转换一下。所以,我们不鼓励你一直保持觉知,这除了是因为会让思维意识钻空子外,还因为这样会使人有些疲劳,重者会影响正常生活。所以,我们鼓励在情绪和身体感受起来时静观,这就能保证我们的静观对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建议你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放松,不给自己任何约束和指导,从而使你生生世世积累的所有观念和业力都能尽快地释放出来,这样就能在一生将所有的观念和业力清除干净。因为,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你累世积攒的观念和愿望才有机会摆脱意识的控制自己呈现出来,使你有机会把它们修去。

3、在静观的那个时刻,我们要求用先天纯粹意识静观,使自己的意念完全放松,静静地体察身体和大脑里的那些感觉,至多再观看一下大脑里的观念,除此之外不需要再做任何事,专注任何地方,包括呼吸,因此,绝对不会发生任何偏差。

4、从理论上来说,最根本的区别有五。

(1) 我们明确提出所有的观念(包括愿望)都不是真正的自己,都是修炼、清除的对象。我们说的“所有观念”就是指你大脑中所存在的全部观念,是没有例外的,包括我们这里说的所有的话。因为,所有的观念,都是后天自我的组成部分,或人类心智结构的一部分,都具有遮蔽我们先天本性的智慧和能力的作用。当你接受了我们这里所说的观念后,到某个时候,这些观念也会控制你,表现为控制你的思维和情绪,此时你就要通过静观把它们也清除,解除它们对你的生命的控制。而现在你只是需要通过这些文字帮助你了解静观、学会静观,它只是一个工具,不要执著于它们。这里相关的理论部分第二部分再讲。

(2) 我们认为大脑里的观念与大脑内的感受、身体的感受是内在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大脑里的每个观念都占据着大脑里的特定的位置,并与身体的某一部分直接相关,或者说控制着身体的某一部分,或者说身体的某一个状况就是有大脑里的某个观念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存在方式才决定着我们的静观过程是从身体的感受、大脑的感受再到观念的。所以,通过对观念的清除才会解决我们身体的所有问题。

(3) 我们明确提出人的两种意识和两种觉知的存在、区别和鉴别方法。这是我们的静观理论和方法最重要、最关键的地方。过去有很多人讲大我、小我,真我、假我,主要是告诉人们后天的自我意识或心智系统或思想观念不是真正的自己,但很少人告诉我们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找到真正的自己。我们通过对静心状态的描述,对静观中先天纯粹意识觉知的表现的描述,使人们能够亲自触摸到真正的自己,并学会用真正的自己来清除、解体后天的自我。这就在理论上把人生的根本、修炼的根本非常清晰地呈现给大家。

(4) 我们明确提出修炼的根本就是解除观念对我们的控制,解除后天自我、思维意识对我们生命的控制,使我们的先天本性或先天纯粹意识能够自由完整地展现出来。而静观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其他的方法都是无效的。但其他方法都可以成为人们学会静观的前期准备,比如念咒,忏悔,观想,观呼吸等都有利于培养修炼意识和定力,对练习静观会有些助益;有这些修炼经历的人,会更容易接受和练习静观。唯有当你能够明确地把静观作为唯一去除执著的方法时,你才能真正地去掉一切执著,不被其他修炼方法干扰。这就把修心和修炼的对象明确地标示出来,使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不需要再寻求其他任何辅助手段,一心一意去静观。

(5) 我们认为真正的修炼都是自己修炼自己,自己净化自己,自己救赎自己,自己成就自己,不需任何外力的帮助。由于你很清楚自己是如何用力的,也知道你是如何使自己一步一步提高上来的,所以,你不会再去崇拜任何人、任何宗教、任何教主或圣人。你会从各种人、思想观念和宗教的精神控制之下自然地解脱出来,实现真正的内在的自由。当然,你也会尊敬任何人、任何宗教、任何教主、圣人。如果你在有些时候产生自大的观念和心态,静观一下立即就解决了。

关系是通向愉悦与自我实现感的桥梁(上)

【美】大卫·A·施沃伦 温蒂·哈默德

天津师范大学 宁娴 博士 译

关系就像是一座冰山。当人们将想法、感受以及不满隐藏在海面以下,不和谐就会产生。清醒的头脑和其对亲密关系的合理欲求则可以想象为冰山的山尖。意识昏乱的、知觉不清的那部分心智所包含的信念和感受,比人们意识到的更多。现在当我们再介绍一个有着类似压抑想法的人出场时,就如同两座冰山的相撞,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而亲密关系的建立也变得极具挑战。

如果缺乏如同真正的朋友之间的坦诚相待以及充分沟通,关系就会萎蔫、死亡。尽管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关系的挑战,心路理论却将与他人建立深层的人际联系,视作唤起生命的考验、尝试,以及为成长提供机遇的理想方式。

“关系代表着对个体的最大挑战,因为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那些仍然位于人的精神之中的昏而未决的问题,会被影响进而激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个体都退避与他人的互动。有时你会持续不断地受到假象的蒙蔽,即认为问题是由他人带来的,只有在他人或她在他在场时,你才会感到不安,而独处时则不会。”——心路讲演第180篇

上述问题触发了我们的情感反应以及防御态度。在亲密关系中,避免频繁的冲突和分歧是不可能的。我们常常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我们的伴侣、同伴和朋友。事实却是,对出现的任何摩擦和不和谐,各方都有责任。只需一丁点儿的洞察力,我们就能认识到自己的反作用模式以及不断重复扮演的角色。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我们都被亲密关系卷入其中,从中得到教益,并最终发展出与自我更加亲密的关系。

在一些文化的、灵性的传统中,孤独以及避免与他人亲密接触被视为与“道”或者生命之源贴近的方式。而事实上,心路理论将关系视为我们与神性接近的捷径。

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存在于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中。这表明它深植于我们的生物性,甚至是我们的生化性质之中。”(Jankowiak, W., and E. Fisher. 1992. 浪漫的爱情:以一种佛陀精神中的跨文化视野观之. p. 127)

深层次人际关系的形成需要生理、心理、情感上的成熟。这要求我们深入地自我审视以及一遍遍地挑战自己的信念和观念。我们会逐渐领悟到,关系的深度对我们的幸福与满足感的实现影响深远。

发掘出被掩埋的东西——何处找寻

对关系产生挑战的因素有很多:其一为人性所固有;其二则根植于我们的童年经验。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欲望和需要,与对他者的恐惧感一样真实。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们自然地与他人联结。成为保护我们抵御危险的群体当中的一员,令我们无论是在现实上还是想象上,本能地感到更安全。然而,当我们被卷入与他人的互动之中,恐惧也油然而生。这种恐惧包括对丧失权力或控制力的焦虑,以及对他人不得不服从于他人的意愿而丧失自我完整性的

从无意识地消极相互作用到有意识地选择爱

由于很少有孩子能得到足够的、成熟的爱与温暖,他们在今后的一生中都抱有饥渴感,除非这种缺少爱和受伤害的状况被认识到并被妥善地处理。否则,成年之后的他们也会无意识地处在对儿时所缺乏东西的强烈渴求中。这将令他们无法成熟地去爱。”——心路讲演第73篇

当你为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你对他人的评价而感到沮丧时,以下图表所列出的概要式处理过程可以为你提供借鉴。在将关系视为灵性道路的语境中,我们总是通过转向内在的过程与他人拉近距离,并由此接近神性。克服或者指出他人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任务。不对他人做评断会十分困难,尤其是当你的评价是基于对他人真实

缺点的认识,从而是正确的时候。不过,所有人都必须经历与你相同的过程,即对自己的缺点和负面因素进行自我探究。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记得,比起让他人指出我们应该了解的事情,自己去发现的感觉有多棒。

爱是自发的行动

我们为爱而生。我们理应突破自我与他人接触,与某种超越我们自身的更伟大的精神接触。突破自我以及去为造物的另一部分所接纳,是一种混合着勇气和谦卑的行为。佛陀说,“就像蜡烛离开火就无法燃烧,人离开了精神生活就无法生存。”那么,就像人无法离开精神生活而生存,个体也不能离开人与人的关系而生存。

有时,我们自身的能量不足以让我们

担忧。我们最早期的关系体验为所有未来的互动提供了模版。虽然我们的身体和智力都在成长,但我们情感发展却有时会滞后于此。潜藏在我们意识之下的,被抑制的不成熟的想法,令我们成年后的关系动荡不定及受到挑战。下面是有关我们从儿时一直持有到成年的两种误解:

“除非我能在某个时刻以意愿的方式得到想要的东西,否则我就不会快乐。”

“如果他们全然地爱我、认同我,并完全依照我的欲望行事,我就会快乐。”

“任何不能达到这种绝佳状态的事物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而必须被改变。否则我就会不开心。而这是他们的错。”

“我之所以不满是因为他人拒绝实现我的愿望。这就是我内心的挫折感和绝望感的来源。”——心路讲演第72篇

我们相信,爱是向对方的一切欲望完全臣服。这一误解导致了人们不敢去爱,因为我们错误地把爱等同于顺从、压抑、屈服。

以成年人的心智而言,完全顺服的要求听起来是荒谬的。但只稍稍加自我探查,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心理。关注来自我们内心的那些声音,然后补写完成以下句子。通过这种方式,你就能发现那个住在我们心中的孩子所犯的错误。这种错误的观念会造成消极的影响,除非它们被发现并被改正。

“这都是他们的错,如果他们能……”

“如果他们真的爱我,他们就会……”——心路讲演第72篇

这种内在的冲突力量表现为:一方面想要亲近,另一方面则恐惧亲密;从而令我们的人生贯穿着紧张与争斗。

对失去权力和控制力的担心 袒露这种冲突,是富有洞察力和内心强大的表现。

检视我们童年的根源

作为孩子,对父母,我们往往要么贬低,要么不真实的过度尊敬。将他们实在地看作是与我们所有人一样挣扎的、不完美的人,并不容易。在成人关系中,我们将重复这一模式:要么让对方看得高于自己,要么低于自己;从而使平衡的、平等的接触成为不可能。只有认识到我们在伙伴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意识到由此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才能获得所盼望的满意关系。

作为孩子,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无力感的折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一个无意识的誓言,那就是要在成年阶段重新夺回我们在童年时所丧失的权力。为了重获我们认为自己曾经不放手的东西,我们实际上再造了与童年阶段类似的痛苦经历。这就是为什么童年有过被虐待经历的人或者童年时父母酗酒的人,会选择与父母类型相似的伙伴。这一要对童年缺失进行补偿的无意识力量,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影响巨大。接下来的步骤将有助于

澄清你内心正发生着的感受:

- 1. 选取一段当前的关系进行挑战。(提示:从中找到你觉得自己非常正确、公正或者受到伤害的部分。)
2. 看看你是否能够感觉到你的愤怒、怨恨、焦虑,或者隐藏在那些表面感受之下的挫败感。
3. 在这些反应背后的,是你未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被爱所导致的原初式痛苦。(你当下情境中的不和谐状态,与这种早期的痛苦非常类似。)
4. 你必须对童年时及成年后的两种不同情境下的伤害进行体会,直到它们就像两张幻灯片,逐渐对焦并合而为一。
5. 然后你就能发现,你是怎样为了纠正童年的痛苦,而营造了眼下的痛苦。
6. 你将逐渐明白,你为何觉得必须去

尝试并夺回你在童年失落的东西,并由此避免失败的痛苦。为了这次取得胜利,你实际上挑起了并忍受着某种痛苦的局面。

7. 你将进而发现,重现童年所受伤害的企图是多么的无意义和无用。如果能将这一新的理解运用于所有你的行为及对他人的反应中,将不仅对你大有助益,对与你相关的人而言也是如此。

你必须对自己从前潜在的愿望、悔恨、想法、观念进行重新安排,将它们与真正的爱和关系联结在一起,并且不再试图纠缠在一场没有赢家的挣扎之中。感受你曾经的挫败感和无能感,并体验其毁灭性的力量。只有这样,你的那种重建人生中令人失望部分的企图才会演变,从而积极的成人关系才能蓬勃发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系全国第一家报刊传媒集团。集团尊奉“开启民智,传承文明”的出版宗旨,集历届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的智慧,探索了一条符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公司实际情况,以“内涵发展,自我裂变”为特征,被业界称之为“广西师大社模式”的发展道路。
集团业务范围涉及图书、期刊、电子音像及数字出版,文化产品的设计制作、印展、销售,以及教育培训、会展、咨询、旅游、艺术品、地产等等,现有29个独立法人的集团公司成员及企业集团成员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济南、成都、南宁、桂林、柳州等地,员工近800人。
公司成立以来,22种图书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图书大奖,先后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高校教材管理先进集体、先进高校出版社,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良好出版社、先进出版单位。第七届、第八届(3年一次)集团公司获奖图书均排名第一。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简介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73年,是环境保护部直属的三个国家级环境科学研究所之一。
华南所始终坚持“立足华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建所方针,坚持以热带、亚热带区域环境问题研究,经济特区、沿海开发区、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群和港澳台等发达地区环境问题研究,河口、感潮河网、海洋等复杂水环境模拟研究,区域、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污染控制方法创新研究等为主要研究方向,承担了大量的国家及华南地区环境科学研究任务,向国家和地方提供了各种管理决策和污染防治技术支持,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在水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工程、近海环境、港澳台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环境信息技术研发和环保产品开发等领域形成特色;在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开发、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开发、水环境模拟理论与技术开发、区域大气环境理论研究、生态工程理论与技术开发、近海环境与海岸带研究、环境战略与发展研究、环境健康和环境信息技术等领域也取得较大的突破和进展。
华南所拥有各类级别最高的环境专业资格证书,涵盖工程咨询、工程设计、水土保持、水资源论证、环保设施运营、环保产品检验、计量认证、科技成果检测鉴定等业务范围。

《世界文化論壇》报 Culture Communication
~面向全球華人,情系人類未來~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世界文化論壇》報由美國中美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2002年在美國創刊發行。面向兩岸三地及北美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深層次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使中國文化和世界上一切先進文化在後現代的多元時代能夠攜手對中國的永續發展與世界的和平進程做自己獨特的貢獻。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大師訪談,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老外學中文、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影響我一學中的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以獨特的視角,反映華人的文化訴求,展現不同文化的風采。
文化廣場促進民族文化百花齊放;放眼天下囊括大事春秋世界風雲。美國大觀、洛城夜話,給華人一個活生生的美國,一個細微的洛城。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看宇宙人生洞若觀火。綠燈人生、成功之道,給人生具體指導。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顯當代大師言傳身教,樹世界華人楷模新風……
《世界文化論壇》可謂大一一心若大海、量包天下;《世界文化論壇》亦可謂小一一星星之火、步履維艱。
但是如果有您的一份,這份小報就能成大氣候。
如果您出一份力,把《世界文化論壇》推薦給親朋好友,讓讀書界人人能夠享受這份思想大餐,這張海外華人文化網路必將因您而玉成。
我們自信《世界文化論壇》是明珠,我們相信您慧眼識得!
《世界文化論壇》一年六期,每期4個版面。
國際標準期刊刊號(ISSN):1540-2339

《世界文化論壇》報 (雙月) 訂閱單
姓名 \_\_\_\_\_ 電話 \_\_\_\_\_
訂閱期數:一年(六期)
詳細通訊地址: \_\_\_\_\_
訂閱費: \$20.00/年(含郵費)
[ ] US\$ [ ] CASH [ ] CHECK
支票抬頭請寫 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郵寄地址: IPDC P 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世界文化論壇>同仁敬啟